

日本・台灣與中國

亞洲的政治文化

邱垂亮／著



亞洲的政治文化

邱垂亮／著



亞洲的政治文化

前進叢書②

作 者／陸 鏗

發 行 人／楊祖珺

出版・發行／前進出版社

台北市安居街6號12F

☎：(02)7328333

郵政劃撥／10575776號前進出版社

印 刷／三榮印刷廠

台北市重慶北路三段223巷15號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 初版

特價2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自序

一

西方政治學與東方政治

叛徒、民主與烏托邦

四五

政治道德

四九

中國讀書人的命運

中、台、港的政治癥結

——亞洲遊學記行

七一

五四運動和明治維新

九五

日本

歷史的嚴顏

一〇九

日本學簡論

一二一

日本的文化變遷

一二七

台灣

蔣經國時代的台灣政治

一四五

從陳文成慘案

談政治縫隙中的知識份子

一五九

「索聲震撼」與民主政治

一七七

文化的創傷

——評孤影的自由、民主、平等觀

一八七

一九八三年台灣黨外的路線鬥爭

二〇一

意識形態的衝突和兩極化

二一三

台灣民主政治的缺憾

——評李敖和楊子

二二三

台灣政治發展的關鍵時刻

二三五

中國

功過一百年——簡評馬克思

二四五

瘦思中國

二五七

在北大談台灣與民主

二八九

一九八三年的中共與中國

三〇一

統一問題

台灣前途

三二三

中國統一的新構想

三四三

再談中國統一的新構想

三五七

北京的「台灣之將來」學術討論會

三六九

失落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

三九三

尾聲

加可蘭達之歌

四〇五

生之夢

四一〇

爲兒子提行李的爸爸

四一四

失樂園的夢——西安情懷

四二二

自序

出生在台灣苗栗的山野裏，成長在台南白河進去深山的牛山上，從小和荒山野嶺爲伴，從小就想當與世無爭，雲遊天下山川名勝的俠客。那是貧窮却又充滿夢想的童年。

中學唸新營和嘉義中學，大學唸台灣大學外文系，書唸得還算不錯。但是，儘管四週紅塵滾滾，我却好像從來沒有從牛山的夢境裏醒來。

大學畢業，當一年兵，大部份時間，駐紮在赤貧的澎湖列島。當完兵，毛遂自薦，跑去新竹中學教了一年英文。二十多年了，我還是念念不忘那位連會談都沒有就採用我的辛志平校長。

一年後，迷迷糊糊、懵懵懂懂，抱着的不是童年遊俠的美夢，而是失落一代流浪者的苦楚，去美國留學，半工半讀，一留就是八年。

不管我的視野是多麼地狹窄、朦朧、不清，那就開始了我二十年的政治學研究生涯。也就開始了這本文集的心路歷程。

八年研究國際關係和比較政府，前半部，對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比較有興趣。後半部，自然地返回到我自己的黃色皮膚、黑色眼睛、中華文化爲主體的亞洲，而以日本和中國一百年來

的政治發展程序、經過和結果，為我的研究主題；而以亞洲傳統文化中自由民主主義發展的可能、可行、必然性，為我學術生命的「極終關懷」。

中間，必然地，夾上了我這個台灣「蕃薯兒」，對國共半個世紀來不斷鬥爭中，台灣政治前途因結重重的命運的深切關心、注意和思考，這是我學術之上生命之根的「極終關懷」。

這本文集，就是兩年多來研究思考這幾個極終關懷問題的結果。它們都是各別發表在不同報章雜誌的文章，但是，貫通每編文章的基本政治理論和思想體系結構，是完全一樣的。

從我自己的政治哲學理念系統的形成和發展，到日本戰後「日本第一」現象的產生，台灣「革新保台」、黨外運動和其他政治問題的發展和變化，中國毛澤東共產革命的實驗結果，以及台灣海峽兩岸國共鬥爭中的統一問題，雖然在寫這些文章時，我並沒有刻意的安排和系統的整合，但是，不謀而合，冥冥之中，它們都因為我自己理念系統的支配和限制，而自然也必然地相互關連貫通，而形成了這本文集的自我一體。

這個一體簡單、明顯的中心意念，就是我政治人心路歷程中培養的自由民主主義的思想和信念。

四十五年的生命，前前後後，也算滄海桑田，但願西方理性主義的學術熏染下，我並沒有失去童年東方浪漫主義的夢想和東西文化沖擊、溶合的理想主義。

這不完全是學者象牙塔裏的研究結果，而是我這個政治研究者在學術裏外漂留二十年的個人的心得和心聲。

這本集子裏的大部份文章都曾發表在《展望》、《中報月刊》、《中國時報》和《七十年代》等報刊。由於這些文章，我交上了不少辦報紙和雜誌的好朋友。

這幾年來，爲了寫這些文章，我也曾使很多人受氣、受罪。我想我是一個相當殘忍的人。不過，不管我說了、做了多少錯誤的話和事，這就是我，我的存在和價值。我先在此道歉。

一九八四年元旦於香港

叛徒、民主與烏托邦 *

前言

在台灣大學念了四年外國文學，在希臘古文學、英國莎士比亞和美國近代作品之間，走馬看花，繞了一圈，迷迷糊糊，似懂非懂。出國後，改學政治，半工半讀，半途出家，在幾位恩師的容忍教誨下，花了七年的漫長歲月，總算拿了一個碩士和一個博士。那是一九七〇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和西方社會變動的開始年代，找到澳洲這個教席，一教就是十幾年了。

回想這將近二十年的西方政治學的教學生涯，實在感覺非常慚愧。一個書房裝滿了千冊的洋書，都是載滿西方政治學家傳道精英之作，有些大師還親身聆聽過他們的講學或演說。但是真正學通了的東西實在太少，幾個政治理論的基本意念想了二十年了，還是沒有完全想通，更何談思想的突破創作，進一步自己找到、發展和創立政治學的新意念和新見解。在教方面，每年一批一批的學生，進來出去，也該有好幾百了吧。雖然其中有幾個已經是大學教授，還有一二十個在政府機構當上了中上級的官了，但是除了兩三個還感覺滿意、還有青出於藍的驕傲感外，實在沒有

感覺到書教得成功。向學生是學了不少，教則是平平凡凡，誤人子弟，好在是誤洋人子弟。在著作方面，那是最慚愧的了，雖然曾發表了不少文章，但除了惹來滿身臭，被人大罵外，沒有一篇達到「立說載道」的標準。最近把它們隨便翻了一下，找來找去，就是沒有一篇滿意的，只有一首和政治學完全沒有關係的小詩，讀起來還順心。

正如上面所說的，我這個政治學家是半途改行、半途出家的。出國進入研究院以前，對中國周公孔子以來的政治發展、政治系統和政治哲學，根本沒有下過功夫、打下基礎。除了懵然無知地繼續成了偉大的五四精神，盲目激烈地「反孔」、反傳統、反封建、反極權專制外，對中國五千年深厚的政治文化，可以說是一竅不通，完全沒有深入研究過。我的政治學，從啓蒙到拿到學位，都是在美國的研究所象牙塔裏面摸出來的，老師都是洋鬼子，讀的大部份是「洋線書」，講的寫的都是「洋涇浜」的洋文。幾年下來，滿腦袋硬填進去的都是半生不熟的「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Western bourgeois liberalism）、行為主義（behaviorism）和經驗論（empiricism）為主體的政治學。

政治思想的啓發

碩士班第一堂上的是政治理論。我最先唸的三本書是卡謬（Albert Camus）的「叛徒」（The Rebel）、史金那（B. F. Skinner）的「華頓第二」（Walden Two）和立甫塞德（S. M. Lipset）的「政治人」（Political Man）。記得教我的那位約

翰生教授，一學期下來，上下打量了我一大陣子，大概在「儒子可教也」和「儒子不可教也」之間繞了好幾圈，明明知道我不很可能升堂入室，但又覺得我這小子一上課就胡言亂語，孔夫子的「之乎者也」亂搬亂吹，常常把他的研究課搞得烏煙瘴氣，實在不知道我的裝腔作勢虛實多少，我究竟是東方哲王孔夫子的幾代門生。結果心頭一軟，來個「留校查看」，勉強讓我及格。

但是，人就是那麼奇妙。雖然到現在我還不能完全了解他們，對他們的思想體系也只能說是一知半解，只有一點點的領悟，卡繆、史金那和立甫塞德就這樣「一見鍾情」地把我深深迷住，緊緊地跟了我二十年。我走火入魔似地練他們的「武功」，研究他們的哲學系統，在他們的思想圓圈內，像史金那的白老鼠一樣，不停地轉了二十年，想了二十年，就像孫悟空在佛祖手上翻跟斗一樣，翻來覆去，翻了二十年，還是沒有翻出他們的魔掌。

後來，還加上了阿蒙德（G. Almond）和我伯（S. Verba）的「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貝爾（D. Bell）的「意識形態的滅亡」（The End of Ideology）和曼海姆（K. Mannheim）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等思想理論。我的教育就差不多大功告成」。

多年來，不管是唸伯拉圖的「政治家」（Statesman）、佛洛伊德（S. Freud）的「文明與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海牙克（F. A. Hayek）的「奴隸之途」（The Road To Serfdom）、修姆伯特爾（J. A. Schumpeter）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或是讀何佛(E. Hoffer)的「信徒」(The True Believer)和阿達德(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或是研究馬克思、托爾斯基、列寧、李大釗、毛澤東和馬古思(H. Marcuse「新左」New Left的鼻祖，主要作品是「單面人」One-Dimensional Man)·我都再也離不開卡謬、史金那和立甫塞德，我都再也離不開我那「政治人公民文化」的自由民主的思想體系。

三家村的尋求

存在主義大師卡謬的「叛徒」是一部政治哲學的大作，它詳細描寫分析歐洲二百年來的形而上學或歷史性的叛變行為，他的結論可以簡單地歸納如下：假如我們決定要生存下去，一定因為我們認為生命的存在有它正面的價值；假如我們決定反叛，一定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社會的存在有它正面的意義。所以，反叛是人類社會行為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層次，有人類社會，就會有不公平、不能了解、或是不理性的現象發生，因為人是唯一不能接受自己現狀的動物，因此就會有反叛行為的產生。也就是說，人是必然的反叛動物。但是，反叛的理由和現象有千萬種，因此反叛是否賦與人「生殺大權」，殺自己、殺別人，甚至於全面性的屠殺，卡謬叫作「殺人的權利和責任」，就變成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和其他研究人類行為學家的最重要、最中心的課題。卡謬也沒有能力完全回答這個問題，他希望找到的是多少可以解釋反叛行為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 culpability)。

在他漫長的尋找過程中，他嚴謹分析人類行爲的各種意念，尤其是「自由」和「恐怖」（liberty and terror），他研究分析從盧梭到史大林各種社會和政治革命追求的自由和造成的恐怖。他得到的結論是反叛和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所有的革命，不管它宣稱的意識形態是多麼崇高偉大，都避免不掉導至獨裁專制。革命只加強了國家壓迫人民的統治力量。從法國革命到蘇俄的十月革命，他發覺都是「以暴易暴」、惡性循環的權力鬥爭，根本沒有反叛的正面意義。根據卡繆，這個反叛的正面意義就是「在混亂中要求次序」（to demand order in the midst of chaos）。

史金那是近三十年來最有影響力、最權威性的社會心理學家，他是現代行爲科學和社會行爲工程學的開山大師和掌門人。他長期利用白老鼠和鴿子來實驗、來證實他的行爲控制和行爲塑造的原理。他的嚴格經驗科學性的研究，證明人是沒有不可控制、不可改變或是不可塑造的基本人性，完全科學的、工程學的控制環境，一定可以產生預先希望和決定的社會行爲。他這個「物質——環境——科學決定論」的行爲工程學，在一個嚴密小心的控制程序下，根據史金那的理想主義，一定可以製造一個人間天堂。在這個天堂裏，人都有良知（good will），都願意工作、創造和和平相處，都有豐富、安全、平等和清潔的生活環境，來追求精神生活的完美，如文學、藝術等的創作。在這個天堂裏，因爲生活環境的完美和行爲控制（conditioning）的成功，人不再有、不會有六情七慾，不會污染環境，不會暴動，不會戰爭。

這就是史金那的「華頓第二」，人類行爲控制工程學的烏托邦。一九七一年他發表了「超越

自由和尊嚴」(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再度轟動西方世界，引起強烈爭論性的反應。這本書進一步肯定了他在「華頓第二」裏面創造的意念。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基本相信「人有不可侵犯的天賦的自由和尊嚴」——天賦人權——根本是自我陶醉的幻想^①。他承認「自由」這個崇高的理想曾經使很多人艱苦奮鬥，推翻極權專制，但是「自由」和「尊嚴」的極端追求，也就是今日西方民主工業社會走向崩潰消滅的主要原因。人類早已「超越」或失去了自由和尊嚴。

因此，爲了維持西方物質生活方式，爲了避免史大林式或毛澤東式的極權專制，西方社會必須放棄這兩個個人幻想出來的基本價值觀念「自由」和「尊嚴」，接受行爲工程學的控制程序，而創造「華頓」的大同世界，一個完全控制的完美世界，一個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人自由和人性尊嚴的完美世界，一個再也沒有叛徒的完美世界。

立甫塞德「政治人」塑造的理想社會和建造這個理想社會的程序，和卡謬及史金那完全不同。他們的意識形態不同，價值系統不同，人性的認識不同。立甫塞德的基本思想體系是西方十八世紀以來傳統的、保守的、「中庸」的自由民主主義。他的「政治人」就是製造這種自由民主人的政治化（也就是社會化）的程序。

他的政治人相信人是有基本人性的，這個基本人性包括七情六慾，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嚮往自由、平等、仁愛、正義等人權尊嚴方面的價值。黑暗的一面出自人爭取存亡的基本自私性。這個自私性使人盡力擴張自己的物質生存的環境範圍。爲了擴張和保護這

個環境範圍，人開始由個人到家庭，由家庭到宗族、部落、和其他大大小小的社會組織，由這些社會組織到「權威性價值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的主權國家，甚至到目前為止仍沒有「槍桿子出政權」的聯合國和其他區域性或世界性的組織，人開始日新月異、不休不息地建造、保衛和擴大他的勢力範圍。結果，利益的不停結合和擴大，引致利益團體的不斷結合和擴大，人剝削人，階級壓迫階級，國家侵略國家，種種殘暴不仁的行為也就越來越多越厲害。終於，「不斷暴亂」和「不斷革命」變成不可避免、不停發生的人類社會現象。

立甫塞德同意卡謬的看法，不斷暴亂和不斷革命只會以暴易暴，一個獨裁專制政權代替另一個獨裁專制政權，只會導致更多的暴亂和革命。不過，他不能同意卡謬「叛徒」以反叛行為來抗議和反對不公平、不自由、不平等、貧窮、欺詐、剝削、愚蠢、奴隸、極權、專制等的方法。他認為解決這些人類痛苦來源的方法應是人類社會利益和權力組織的合理、合法和制度化。

他和史金那對人性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是極端相對相反的。因此，他根本不能接受史金那「華頓」行為改造控制式的解決方法。對他說來，史金那的烏托邦根本不可能實現，實現了，也不能解決人類的問題。

結果，立甫塞德在卡謬和史金那之間尋找了一條保守的、中庸的中間路線。他接受人類社會必然有不等階級的存在，他接受人類社會一定有貧富差距和權力差距的存在。這個階級高低、貧富大小和權力多少的不同是人類社會不可避免、不可剷除的「自然現象」，是人性存在的必然結